第一章

这个男人和他的时代

在帝制中国，个性被视为颠覆性的。 戴震在1776年出版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新个性的完全发展和系统阐述的视角，但当它首次出版时，却未能引起太大的兴趣——只有偶尔对一个没有考试证书的卑微学者谈论挑战哲学原则的居高临下的评论。 直到二十世纪，历史学家们才开始将这部著作视为早期现代个人主义和客观方法论的融合，这是对在中国主导了几个世纪的知识和文化场景的新儒家主义的一次打击。1

在早期的现代中国，个人主义并未在哲学或政治话语中得到典型的表述。 在早期的现代中国，个人主义并未在哲学或政治话语中得到充分表达，而是隐藏在对经典经文的评论中。 在早期的现代中国，个人主义并未在哲学或政治话语中得到典型的表述。它被埋藏在对古典经文的评论中。戴震（1724-1777）将个体视为社会单位，而非思考或道德主体，开始系统地阐述社会、经济和生物学上每个个体的需求。 在早期的现代中国，个人主义并未在哲学或政治话语中得到典型的表述，而是被埋藏在对经典经文的评论中。戴震（1724-1777）将个人视为社会单位，而非思考或道德主体，开始系统地阐述社会、经济和生物学上每个个体的需求。这一智识议程巧妙地隐藏在他对古代文本的研究中，并似乎符合儒家经典的长期注释传统中的可接受做法。

然而，任何个性的表达都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帝国正统观念、政治等级制度或社会秩序。 然而，任何个性的表达都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帝国正统，政治等级制度或社会秩序。为什么戴会冒这个风险？位于18世纪中国商业中心徽州的戴，并不属于任何公司，军事或商人世家。 他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力。 简而言之，戴并未享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地方、商业和国家精英所拥有的任何初始特权。 为什么戴会做出这种冒险的举动？戴位于惠州，这是18世纪中国的商业中心，他并不属于任何公司、军事或商人世家。他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力。简而言之，戴并没有享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地方、商业和国家精英的任何初始特权。虽然在他搬到的皇家首都，有教养的社会期望有复杂的饮酒游戏和诗歌创作，但他的举止始终严肃、笨拙、坚忍。 他一生中从未为私人或社交礼仪创作过诗歌。 作为文人社会的不合群者，戴不会与控制他所处时代知识议程的许多“权力精英”交往。 尽管在皇家首都的文明社会中，人们期望有复杂的饮酒游戏和诗歌创作，但戴氏迁移到这里后，他的举止始终严肃，笨拙，坚定。他一生中从未在私下或为社交礼仪创作过诗歌。作为文人社会的不合群者，戴氏不会与控制他时代知识议程的许多“权力精英”交往。戴氏以严元（1635-1704）和李宫（1659-1733）的知识努力为起点，他们是对自我和社会的新儒家正统观点的两位批评者。 新儒家是一种道德、社会和形而上学哲学体系，首次在十二世纪提出，并在十五世纪初新近巩固的明朝被详细阐述。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新儒家的正统观并没有在没有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发展。 特别是颜元和李宫，他们对新儒家的核心进行了有效的解构，使戴能够构建一个积极的画面，展示社会的个体成员应该如何并且能够将他们的社会、经济或生物需求融入到一个集体形态中。这是一个务实的，但并非激进或颠覆性的，智识行动。 戴的卑微出身肯定影响了他对于他后来职业生涯中成为一部分的知识精英结构的看法。

戴震一直被描绘为中国现代个人主义的先驱。 著名的知识分子胡适（1891-1962）是第一个在戴震的著作中发现这种新的儒家主义方法的人。 在1927年出版的《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将《孟子辞义考》呈现为一部应该改变中国知识史进程的智力巨作。 胡适称之为“新哲学”，从中戴震可以同时攻击形而上学和伪科学。 根据胡适的说法，戴震的方法论后来成为了一种不妥协且具有潜在革命性的人本主义的本土胚胎。 戴震不仅在18世纪打破了文本和非文本方法论之间的区别，而且预见了19世纪关于古典学习中本质和工具之间区别的辩论。 根据胡的说法，正是戴的革命立场，使他的批评者甚至追随者无法理解他的真正信息。 换句话说，胡适将戴震重新塑造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先知。4 溝口雄三，一位具有敏锐比较洞察力的知识史学家，将戴震的个人主义系统化的表述称为“现代性的萌芽”（kindai no hga），他认为这预示了十九和二十世纪基于“公理”（gong li）观念的科学世界观的出现，这种观念将天理的规范结构转变为人类价值的普遍系统。5

尽管戴先生做出了值得赞扬的贡献，但他在拒绝了他所处时代的皇家正统和新儒家思想，发展自己的古典观念后，仍然是孔子的追随者。 戴仍然是儒家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和智识含义。 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帝制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孔子作为古代思想和价值体系（道）的调解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孔子对自己的定位。 当李贽（1527-1602）对伟大的老师的记录表示怀疑时，他被逮捕了。

破坏明朝的皇家正统，且在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破坏明朝的皇家正统，并在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破坏明朝的皇家正统，并在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那么，他是真正信奉儒家经典的人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 与李质不同，戴先生多次试图通过公务员考试制度中的最高难关，并寻求成为乾隆皇帝朝廷（在位1735-96年）的工作人员，这证明了他并非政治颠覆者。那么，他是真正相信儒家经典的人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然而，他的承诺在两个意义上变得复杂：他在成熟的岁月里变成了新儒家传统的激烈批评者，这在他的《孟子辞义考证》中有所体现，他不同意惠东基于汉代诠释家的权威方法，这在他对光宫的研究中显而易见。

如果他既不是被清朝正统定义的新儒家，也不是被汉朝诠释遗产定义的原始儒家，那他是什么样的儒家呢？戴的方法论，基于早期现代欧洲的宇宙地理学和球面三角学，是他重构古典世界的主要工具。 如果他既不是被清朝正统定义的新儒家，也不是被汉朝诠释遗产定义的原始儒家，那他是什么样的儒家呢？戴的方法论，基于早期现代欧洲的宇宙地理学和球面三角学，是他重构古代世界的主要工具。他的技术方法论和古典视野的结合表明，他既不是新儒家，也不是主张回归原始儒家的保守派。 如果他既不是被清朝正统定义的新儒家，也不是被汉朝诠释遗产定义的原始儒家，那他是什么样的儒家呢？戴的方法论，基于早期现代欧洲的宇宙地理学和球面三角学，是他重构古典世界的主要工具。他的技术方法论和古典视野的结合表明，他既不是新儒家，也不是主张回归原始儒家的保守派。相反，他是一位有着独特眼光的前瞻性思想家。

戴及其崇拜者并不总是对儒家经典有着相同的承诺；他们并不总是对如何解释特定段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可能也不同意如何使用实证证据来解释经典文本。 戴及其崇拜者并不总是对儒家经典有着相同的承诺；他们并不总是对如何解释特定段落达成一致；他们可能也不同意如何使用实证证据来解释古代文本。但他们对古代世界有着共同的乌托邦式的愿景，并相信他们的创新方法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唯一途径。 戴及其崇拜者并不总是对儒家经典有着相同的承诺；他们并不总是对如何解释特定段落达成一致；他们可能也不同意如何使用实证证据来解释经典文本。但他们对古典世界有着共同的乌托邦式的愿景，并相信他们的创新方法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唯一途径。他们共享的方法容纳了早期现代欧洲科学，并采取了对“西方学问”更为宽容和包容的观点。他们共享的愿景是寻找一个宇宙和政治秩序，他们都相信这个愿景比他们的新儒家前辈的愿景更加辉煌和宽大。 换句话说，他们制定了一个他们相信他们的新儒家前辈有系统地、有目的地扭曲和忽视的古典世界的宇宙和政治秩序的蓝图。

尽管戴及其崇拜者们共享古典视野和创新方法论，但他们仍然是儒家学者，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孔子传递的古代记录，才能接触到作为道德和政治行动基石的古典世界。 尽管戴氏和他的崇拜者们共享古典视野和创新方法，但他们仍然是儒家学派，因为他们认为，古典世界是道德和政治行动的基本试金石，只能通过孔子传播的古代记录来接触。但他们非常确定，古代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改变和损坏，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重建它们的原因。 尽管戴氏和他的崇拜者们共享古典视野和创新方法论，但他们仍然是儒家，因为他们相信，古典世界，作为道德和政治行动的基本基石，只能通过孔子传递的古代记录来获得。但他们非常确定，古代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改变和损坏，这正是他们必须竭尽全力重建这些记录的原因。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重建古代的必要手段。 尽管戴及其崇拜者们共享古典视野和创新方法论，但他们仍然是儒家，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孔子传递的古代记录，才能接触到作为道德和政治行动基石的古典世界。但他们非常确定，古代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改变和损坏，这正是必须尽一切努力重建它们的原因。他们毫不犹豫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重建古代的必要手段。相反，这些“新”儒家仍然在儒家经典的解释范式内运作，这并不应妨碍我们欣赏他们的创新方法论和视野。 戴尤其是这两者中的引领者和创新者。

戴震一开始是个无名小卒 戴震一开始只是个无名小卒，但他仍然设法在1755年吸引了北京的知识分子的注意，而且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扬子江下游三角洲的知识界的焦点。 然而，这一切在1777年因他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皇家图书馆项目的职务并搬到北京后而停止，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世。 戴震一开始是个无名小卒，但他在1755年成功吸引了北京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江南地区的知识焦点。然而，这一切在1777年因他被任命为《四库全书》的皇家图书馆项目并搬到北京而结束，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直到去世。戴震乘着古典学术的高潮，但他的遗产如何被看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然而，他在1755年成功吸引了北京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江南地区的知识焦点。然而，这一切在1777年他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项目的皇家图书馆馆员并搬到北京后就结束了，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世。戴骑着古代学术的高潮，但他的遗产如何被看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1870年之前，他主要被视为一位杰出的实证学者和数学天文学家；直到20世纪初，他才被提升为一位使中国摆脱封建过去的批判性思考者。

戴认为新儒家的正统观念是对政治压迫的麻木不仁和具象化工具。 然而，这应该在“自我与社会”和“私人与公共”等表达的背景下理解，这些表达只有在新的个性观念出现时才能形成。 戴氏、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都非常清楚他对个体之间关系作为社会基础的描述的政治含义。 然而，这应该在“自我与社会”和“私人与公共”等表达的背景下理解，这些表达只有在新的个性观念出现时才能形成。戴，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都非常清楚他对个体之间关系作为社会基础的描述的政治含义。对中国个性的研究为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对早期现代中国和日本的自我与社会历史的比较，补充了在欧洲自由主义框架下对这些概念的研究。6戴的新社会哲学是由他开发的探索古典世界客观存在的方法所可能的。7

更重要的是，戴的政治观念源于他的方法论，从数学天文学到分析音韵学。总的来说，他出版了22本共计2129页（104卷）的著作。他的大部分著作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 更重要的是，戴的政治观念源于他的方法论，从数学天文学到分析音韵学。总的来说，他出版了22本共计2129页（104卷）的著作。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被描述为高度技术性的。然而，当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戴的政治道德哲学，而这部分内容在他的著作中所占比例不到5%。 更重要的是，戴的政治观念源于他的方法论，从数学天文学到分析音韵学。总的来说，他出版了二十二本著作，共计2129页（104卷）。他写的大部分内容只能被描述为高度技术性的。然而，当代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戴的政治道德哲学，这部分内容在他的著作中所占比例不到5%。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的主题——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分析音韵学和历史词源学——很少被纳入对他思想的任何研究中。

胡适再次成为首位认识到戴的方法论的现代思想家。 胡适写道：“清朝的古代学者强调如何将他们的话语基础。” 这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第一组依赖于证据，根据顾炎武（1613-1682）的说法，这可以涉及直接证据[本证]或间接证据[旁证]。 第二组依赖于权威，即使用古代先例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第一组依赖于证据，根据顾炎武（1613-1682）的说法，这可能涉及直接证据[本证]或间接证据[旁证]。第二组依赖于权威，即使用古代先例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惠栋（1697-1758）和他的追随者属于第二组，他们崇拜汉代的诠释者。”11 胡赞扬了第一组的成就，他断言，如果没有发展出强大的评估证据的技术，那么清朝就不会有真正的古典学问。 第二组——惠东和他的追随者

追随者们一直盲目崇拜汉朝古代学者的权威，并坚持所有的古代知识都应遵循并扩大汉朝古代学问的权威。12 惠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方法最好可以用历史学家周凯荣的短语来概括：古代学问的纯粹解释学。